

# 童工劳工标准的理论分析

陈建国

(南开大学跨国公司研究中心 天津 300071)

**内容摘要:** 本文试图从理论上证明,童工产生的原因不是为了追求发达国家所标榜的“劳动倾销”,而是贫穷;禁止进口童工生产的产品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童工问题”,要想从根本上取消童工的使用,根本方法是发展经济、健全资本市场。

**关键词:** 童工; 劳工标准; 理论

**中图分类号:** F     **文献标识码:** A

## 一、 简介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使一些本来是国内问题泛国际化,劳工标准即是其中的问题之一。发达国家认为发展中国家的劳工标准较低或执行不力,其产品具有低成本优势,对于发达国家来说是不公平竞争,是劳工倾销,因而要求全球统一劳工标准或对在低劳工标准下生产的产品出口进行制裁。

劳工标准指国际劳工组织(ILO)成立以来以国际劳工公约和建议书形式记录下来所形成关于处理劳动关系和与之相关的一些原则和准则。到2001年, ILO共通过了184项公约或建议书,涉及劳工权益的各个方面,其中的核心劳工标准主要指强迫或被迫劳工(第29、105号公约)、结社自由(第87、98号公约)、有关歧视(第100、111号公约)和禁止童工(第138、182号公约)。童工问题是劳工标准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据国际劳工组织统计,在1995年至少有1亿2千万5至14岁的儿童在做全职工作,其中很多儿童在危险或对身体有害的环境中一天工作10个小时以上。实际上,有史以来童工问题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于任何国家的任何历史阶段,特别是西方工业革命时期,童工问题显得尤为突出,目前童工仍大量存在于第三世界国家。统计结果表明<sup>1</sup>,亚洲的童工绝对数量最大,但考虑到亚洲人口众多这一因素之后,非洲的童工比率最高,其次是亚洲,并且童工的比率随着经济的发展呈不断下降趋势,特别是一些国家童工比率下降很快,比如意大利、中国和印度。

对童工问题的理论研究可以追溯到马克思、马歇尔以及庇古等一些著名经济学家,他们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详细阐述。近年来,讨价还价模型在童工问题中得到了大量应用,这里面既有家庭中父子之间的内部博弈模型<sup>2</sup>,也有处于家庭之外的父母亲同雇主之间的外部博弈模型,这两种模型从不同的角度对童工问题进行了讨论。在内部博弈模型中,假设孩子与父母分别有不同的效用函数,且在家庭加权平均效用函数中各自所占的权重取决于他们各自的收入。该模型的假设和现实情况不大吻合,首先15岁以下的孩子根本没有讨价还价的能力;其次一般说来父母都是利他的,没有哪位家长愿意让自己的孩子去工作,只是出于生活所迫。虽然外部博弈模型考虑到了孩子没有讨价还价的能力这一因素,但在博弈过程中没有牵涉到孩子,该模型仍然是以父母效用最大化为前提,孩子的福利根本没

<sup>1</sup> Asharie(1993)、Grootaert and Kanbur(1995)和ILO(1996)都曾对此有过详细的研究。

<sup>2</sup> 请参阅Bourguignon and Chiappori(1994)、Moehling(1995)、Udry(1996)、Agarwal(1997)等文章。

有任何人去考虑，这完全不符合现实情况。利他模型和童工的动态模型更符合现实。

## 二、利他模型

通常，如果父母亲的收入足够高的话，是不会让自己的孩子去做工的，假设对于任何一个家庭来说，成人总是处于完全就业状态下，并且存在一个工资水平  $w_i$ ，当且仅当市场工资水平高于  $w_i$  时，父母不让自己的孩子出去做工；并且童工劳动与成人劳动可以完全替代，假定一单位的童工相当于  $\gamma$  单位的成人劳动 ( $0 < \gamma < 1$ )；同时还假设： $\bar{w} = \max_i w_i$ ， $\underline{w} = \min_i w_i$ 。

根据上述假设，可以得到图 1 中  $AA'$  所示的成人劳动供给曲线，当工资水平高于  $\bar{w}$  时，没有孩子去做工，如果工资水平处于  $\bar{w}$  与  $\underline{w}$  之间时，童工的数量会随着工资水平的下降而增多，此时会出现童工与成人的混合供给曲线  $BGC$ ，当工资水平降到  $\underline{w}$  以下时，所有的孩子都将出去做工，在这种情况下劳动供给曲线为  $TT'$ ，其中  $OT$  是市场上所能提供的最大劳动供给量，其值为  $OA' + \gamma N$ （其中  $N$  为经济体中孩子总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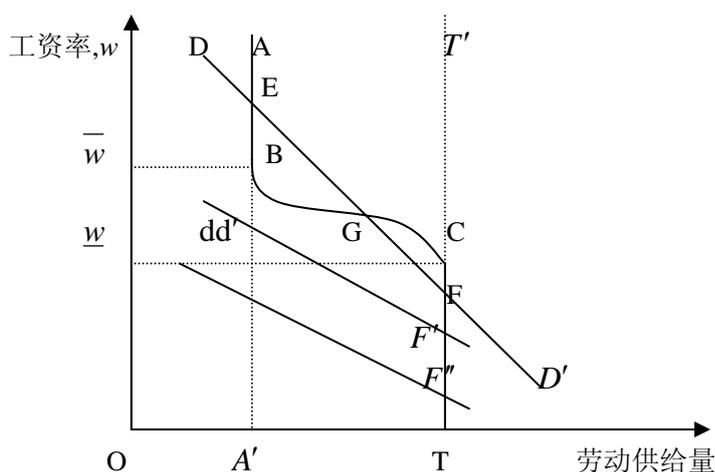


图 1 童工与成人劳动完全替代时的劳动供给曲线

如果劳动需求曲线为  $DD'$ ，很显然它与劳动供给曲线有三个交点，也即存在三个均衡  $E$ 、 $G$  和  $F$ ，但  $G$  点是不稳定的。在  $F$  点，工资水平低且所有的孩子都去做工，这是我们所不想看到的；在  $E$  点，工资水平高且所有的孩子都不出去工作。如果政府通过法律规定禁止童工或者规定工资水平要高于  $G$  点所对应的工资率  $w_G$ ，市场将会在  $E$  点达到均衡，此时没有孩子去做工且成人的工资率也较高，有趣的是经济体一旦达到  $E$  点，再也不需要进行持续干预就可实现良性均衡。Basu 和 Van 将这种干预称之为“良性干预” (benign intervention)。因此当存在双重稳定均衡的情况下，劳工标准非常有存在的必要。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良性干预”并不总是能够奏效，当劳动需求曲线离原点较近时，比如  $dd'$  只与需求曲线  $ABCT$  的  $CT$  部分相交一次，强行禁止童工劳动是不明智的，无论是对孩子还是对成人来说他们的福利水平都会下降。要想减少童工，唯一的办法就是提高劳动生产率，使劳动需求曲线向远离原点的方向移动。

发展中国家生产力水平低下，大都不存在“良性干预”的可能，比如在埃塞俄比亚，10-14岁的儿童中工作的有42.3%，人均年收入约在110美元左右，突然禁止童工会对很多家庭生活产生重大影响，即便是较富有的印度、巴基斯坦等国一下子取消童工也不是个好主意；在印度的实地研究人员报告说，一些地区是如此贫穷以至于最佳政策是允许儿童在上学的时候也做一些工作，做些工作、挣些钱是儿童上的起学的唯一途径；近年来在秘鲁的研究也趋于证实这一观点。因此在存在单一均衡的情况下，要求世界各国执行统一的劳工标准（消除童工），只能使穷国更穷，因为他们不能在短期内革新技术结构。

如果再考虑到发展中国家大量非正式地下工厂的存在，情况将会变得更加糟糕，禁止童工使用将使孩子们面临两种选择，要么挨饿，要么到地下工厂去做更可怕的工作，一些部门是非常令人沮丧的。从理论上讲，由于地下工厂的生产条件极其恶劣，生产效率更差，劳动需求曲线  $dd'$  会进一步向原点移动，均衡点也会从原来的  $F'$  移动到  $F''$ ，即无论孩子还是成人的福利都会变得更差，来自孟加拉和尼泊尔的证据都证实了这一点。

因此，如果我们真正的目标是帮助儿童的话，那么域外的行动就不应该是单纯的限制童工，或者是禁止进口童工生产的产品，即不能让贸易与童工问题挂钩。

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的水平（或者说存在多重稳定均衡）且存在自由贸易时，制定全球统一的劳工标准（消除童工）是一种“良性干预”，但是需要世界各国的相互协作，否则的话则会出现类似“囚徒困境”的集体福利下降，在这种情况下贸易与童工问题挂钩是合理的而且也是必要的<sup>3</sup>。但目前的世界经济发展状况决定了两者挂钩是不可取的。

### 三、动态模型

以上分析都是建立在静态分析基础之上的，下面这个模型<sup>4</sup>将从动态角度来考虑童工问题及其应对措施。

假设每个人的生命都分成两个阶段，分别是孩子和成人，并且总是在成人的初始阶段生下自己的下一代；作为孩子由两个选择，要么工作要么上学以便获得人力资本；孩子的一天被计为1，假设一天中孩子有  $e$  ( $e < 1$ ) 部分的时间用于工作，那么他获得的人力资本是  $h=1-e$ ；对于成人来说，积累的人力资本越多生产效率就越高，获得的报酬也就越高，如果用  $L$  来表示一个成人一天的产量的话，那么：

$$L_t = L(h_{t-1}) \quad (1)$$

并且满足： $L' > 0, L'' < 0$ 。同时还假设一个非熟练成人劳动一天可以生产1单位的产量，即  $L(0)=1$ 。在一个完全竞争的劳动力市场上，工人只是价格的接受者，如果非熟练成人劳工获得的收入为  $\bar{V}$  的话，那么一个熟练成人劳工获得收入为：

$$w_t = \bar{V} L(1 - e_{t-1}) \quad (2)$$

<sup>3</sup> 在存在多重均衡时，禁止童工使用是一“良性干预”。然而当存在发展程度相当的很多国家时，问题变得不再那么简单，因为对每个国家来说选择不实行干预都要占优于实行干预。任何国家的单边提高劳工标准都会使本国工人福利水平下降，同时还引起了资本的外逃；而其他国家则从中获益。因此没有哪个国家会主动禁止童工使用。如果所有的国家同时禁止童工使用，资本外逃将不再发生，所有工人的福利水平都得以提高，能够实现“良性干预”。

<sup>4</sup> 该模型参考了Basu(1999)。

$$e_t = e(w_t) = \begin{cases} 1 & w \leq \bar{w} \\ e(VL(1 - e_{t-1})) = \varphi(e_{t-1}) & \bar{w} < w < \bar{w} \\ 0 & w \geq \bar{w} \end{cases} \quad (3)$$

并且满足  $e'(w) < 0$ ，即父母的收入越高，孩子用于工作的时间越短。现在我们来考察  $e_t = \varphi(e_{t-1})$  这个复合函数，因为  $e'_t = \varphi'(e_{t-1}) = -e'VL'(1 - e_{t-1}) > 0$ ，所以：

$$\max_{e_{t-1}} e_t = \varphi(1) = e(VL(0)) = e(V), \quad \min_{e_{t-1}} e_t = \varphi(0) = e(VL(1))$$

图 2 表示了一个具有代表性的  $e_t = \varphi(e_{t-1})$ ，它与 45° 线  $OO'$  有三个交点，其中均衡点 B 是不稳定的；在 C 点贫穷的父亲让孩子多做工作少上学，孩子长大以后由于积累的人力资本太少，只好让自己的下一代重复他所走过的路，从而形成一个所谓的“童工陷阱” (child labor trap)；而在 A 点则是一个良性循环。但是 A 点也不是最优的状态，它还有向原点靠近的可能，在原点处富有的父亲让自己的孩子把全部时间都投入到学习中，并且世代传下去，从根本上解决了童工问题。下面我们就要考虑如何避免 C 点，以及如何使 A 点尽可能地靠近原点。

假设最初经济体在 C 点达到稳定均衡状态，政府有进行“良性干预”的可能，从理论上讲，如果其中的一代受到了良好的教育，C 点这个稳定的均衡就可以被打破，转向另一稳定均衡状态 A，并且不需要持续性的干预。这里的关键问题是如何使贫穷父母的孩子受到良好的教育。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单纯禁止童工使用的效果是不会太好的，因为即使认真执行该政策也不能保证孩子去上学，一方面家庭贫穷，另一方面可能转入地下工厂做工或帮助父母做些零活。就目前我们国家来说，在一些落后的农村，小孩辍学的现象还时有发生，部分原因是家境贫寒，国家也没有太多的经费扶持<sup>5</sup>。总之发达国家所主张的禁止进口童工生产的产品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童工问题的，甚至使问题变得更糟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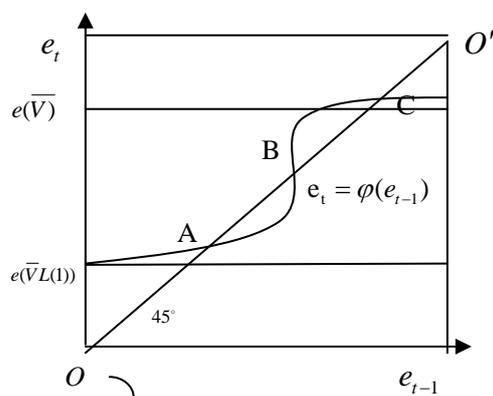


图 2 针对童工陷阱的良性干预

许多学者对如何使贫穷父母的孩子受到良好的教育进行了研究，Parson and Goldin(1989)指出对教育投资的次优选择与有效资本市场是紧密相连的；Jacoby and Skoufias(1997)的研究也得出了相似结论。学生能够获得合适的助学贷款可以使许多孩子幸

<sup>5</sup> 除此以外就小孩本身而言他也不愿上学，此外父母的让孩子受教育的意识也不强。

免辍学，特别是对于那些因暂时的而非长期的原因导致的失学，比如由于父母的暂时失业或巨大的医疗开支所导致的暂时不幸。不过要建立一个能够提供儿童助学贷款的有效资本市场是很不容易的，因为这种贷款的不确定性因素太大，并且时间跨度又太长，没有哪家金融机构会愿意提供这种贷款业务。如何处理这些问题是我们今后需要研究的一个重大课题。Baland and Robinson(1998)提供了一个两阶段模型，该模型指出，当父母为了孩子上学把所有的资产都花光后，父子之间可以订立一个契约，父亲以孩子受教育的名义贷款，等孩子长大以后再予以偿还，但是否会有一个组织来实施该契约是一个问题，因为该契约会导致“逆向遗留”（inverse bequests）的道德风险。

下面我们来考虑如何使 A 点尽可能地向原点靠近，由于  $\min e_t = \varphi(0) = e(\bar{V} L(1))$ ，且  $e'(w) < 0$ ，要想使  $e_t$  的最小值足够的小，只能使  $\bar{V} L(1)$  尽可能的大。因此有两种途径来达到该目的，一是增大非熟练成人劳工获得的收入  $\bar{V}$ ，增强工人的讨价还价能力不乏是一个好办法，或者是规定非熟练劳动力的最低工资率，但最根本的方法只能是发展经济，总之设法增加成人非熟练劳动力的报酬，以便使成人有更多的金钱来供养自己的孩子上学；第二个途径是使  $L(1)$  尽可能的大，即提高受过良好教育的成人的生产率，这样可以增强让孩子受教育的吸引力，以期获得丰厚的远期回报，可以通过适当拉开建立在教育程度基础之上的收入分配，或者提高教学质量来达到该目标。

#### 四、小结

从利他模型可以看出，劳动需求曲线与劳动供给曲线相交会出现三种情况：一种情况是距原点较远的劳动需求曲线与供给曲线只有一个交点，此时所有的孩子都不去做工，富有的发达国家大多属于此类；另外一种情况是有多个均衡点，此时有“良性干预”的可能，不过这种情形不大符合现实情况，即便存在这样的国家也大多属于转型中的中等发达国家，此时非常有必要制定统一的国际劳工标准；第三种情况是距原点较近的劳动需求曲线与供给曲线只有一个交点，贫穷的发展中国家大都属于此类，强行禁止童工使用对本国来说不是一个好主意，将会使孩子和成人的福利水平都下降，要想减少童工使用，最根本的方法是发展经济、提高劳工生产率，使劳工需求曲线向远离原点的方向移动。许多实证检验也都证实了这一点，Levy(1985)在对埃及农村研究后发现，机械化是童工减少的一个重要原因；Scholliers(1995)的一项针对跟特和比利时童工的研究表明19世纪中期12岁以下儿童做工的比例大幅下降，但这一过程并未伴随任何法律的因素，Moehling(1998)的研究也证明了这一点，她运用DDD(difference of difference of difference)的方法对美国1880至1910年间童工急剧减少进行了研究，发现最低年龄限制的效果几乎为零；Brown, Christiansen and Philips(1992)对美国水果和蔬菜罐头工业研究后发现，经济因素和立法对减少童工使用的作用都是很重要的，但经济因素更有效，Nardinelli(1990)的研究更为突出经济因素的作用，他指出对于制止童工问题来说，立法手段是没有经济发展有效的，正确的措施是等待经济的进步。

动态模型也证明，避免“童工陷阱”的关键是让贫穷父母的孩子受到良好的教育，而不是单纯的禁止童工使用，健全的资本市场可以做到这一点；同时还证明提高非熟练成人劳动和受过良好教育成人的收入也是削减童工使用的好方法。

但也有实证研究突出了立法的作用，Bolin-Hort (1989) 在对英国曼彻斯特棉厂研究后则发现立法对减少童工起到了重要作用，我们可以认为当时的英国是转型中的中等发达国家，那时的英国完全有能力来取消童工的使用，该立法行为实际上是政府的一种“良性干预”。

总之，童工产生的原因不是为了追求发达国家所标榜的“劳动倾销”，而是贫穷，禁止进口童工生产的产品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童工问题”。

#### 参考文献

1. Agarwal, Bina(1997), “Bargaining” and Gender Relations: Within and Beyond the Household, *Feminist Economics*, vol.3(1),1-51.
2. Ashagrie, Kebebew(1993), Statistics on Child Labor, *Bulletin of Labor Statistics*, Issue No.3, International Labor Organization, Geneva.
3. Basu, Kaushik (1999), Child Labor: Cause, Consequence and Cure, with Remarks on International Labor Standards,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37, September, 1083-1119.
4. Bolin-Hort, P.(1989), *Work, Family, and the State: Child Labor and the Organization of Production in the British Cotton Industry, 1780-1920*, Lund University Press, Lund.
5. Bourguignon, Francois and Chiappori, Pierre-Andre(1994), The Collective Approach to Household Behavior, in Richard Blundell, Ian Preston and Ian Walker(eds), *The Measurement of Household Welfar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U.K.
6. Brown, Martin, Christiansen, Jens and Philips, Peter(1992), The Decline of Child Labor in the US Fruit and Vegetable Canning Industry: Law or Economics, *Business History Review*, Vol.66(4), 723-70.
7. Grootaert, Christiaan and Ravi Kanbur(1995), Child Labor: An Economic Perspective, *International Labor Review*, Vol.134,187-203.
8. ILO(1996), *Economically Active Populations: Estimates and Projections,1950-2010*, International Labor Organization, Geneva.
9. Jacoby, Hanan G. and Skoufias, Emmanuel(1997), Risk, Financial Markets, and Human Capital in a Developing Country,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Vol.64,311-35.
10. Levy, Victor (1985), Cropping Pattern, Mechanization, Child Labor, and Fertility Behavior in a Farming Economy: Rural Egypt,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Vol.33.
11. Moehling, Carolyn M.(1995), The Intrahousehold Allocation of Resources and the Participation of Children in Household Decision-Making: Evidence from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America, mimeo: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12. Nardinelli, Clark(1990), *Child Labor and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Bloomington.
13. Parsons, Donald O. and Claudia Goldin(1989), Parental Altruism and Self-Interest: Child Labor among late Nineteenth-Century American Families, *Economic Inquiry*, Vol.27,637-60.
14. Scholliers, Peter(1995), Grown-ups, Boys and Girls in the Ghent Cotton Industry: The Voortman Mills, 1835-1914, *Social History*, Vol.20.

15. Udry, Christopher(1996), Gender,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and the Theory of the Household,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104(5),pp.1010-46.

## **Child Labor and Labor standards: An Analytical Approach**

Chen Jianguo

(Center for Transnationals' Studies of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1,China)

**Abstract:** The article is to testify that why child labors are popular is not out of "labor dumping" argued by developed countries, but the poverty. Embargo on the goods produced by child labor could not be able to solve "child problem", rather,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onstruction a capital market are essential for elimination of child labor.

**Key Words:** child labor; labor standards analytical approach